北福地遗址出土的人面纹陶片及相关问题

张文静[1]　王晓琨[2]

（1. 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2.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

〔关 键 词〕北福地遗址　人面纹陶片　面具

〔内容提要〕北福地遗址出土的145件人面纹陶片，形制特殊引人注目。发掘者和研究者多认为是假面面具，是目前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且有明确地层关系的面具。从这批人面纹陶片的出土层位出发，同时注意观察制作方法、颜色及与房屋布局的关系等问题。通过类型学分析，发现北福地遗址的人面纹陶片至少可以分为三组，各组的功能亦不同。第一组可能是用来佩戴的面具，经过与现代人的脸部测量数据比对，佩戴者很可能是女性；第二组可能是手持的物品；第三组可能是用于悬挂的饰品。

〔中图分类号〕K87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83(2023)02－0054－08

DOI:10.16422/j.cnki.1001-0483.2023.02.004

Key words: Beifudi Site　Human－mask design Pottery Shard　Mask

Abstract: The 145 unique human－mask design pottery pieces unearthed at the Beifudi site are particularly noticeable. Most of the excavators and researchers have identified it as a mask, which is the earliest mask with clear stratigraphic relationship in China and even in the world. The paper studied the layers where these human face pottery chips were unearthed, and focused on the production method, color and relationship with the house layout. Through typological analysis, it showed that the pottery pieces with human－mask design in Beifudi Site could be divided into at least three groups, and each group had different functions. The first group might be masks to wear, and after comparing with the facial measurement data of modern people, the wearer was likely to be a female; The second group might be hand－held items, and the third group might be ornaments for hanging.

北福地遗址地处太行山东麓，中易水河畔，是华北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1985年首次发掘即有重要收获①，2004年的发掘入选该年度的“中国十大考古发现”。在2007年出版的《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②报告（以下简称《北福地》）中，发掘者段宏振提出了“北福地第一期文化”和“北福地第二期文化”的文化命名，两期文化的绝对年代，分别距今约8000—7000年和7000—6700年。

第一期文化是北福地遗址的主要遗存，处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晚段，发现了房址、祭祀场、陶器、石器、玉器等重要遗迹遗物，特别是在房址和灰坑中发现了大量人面纹陶片，发掘者在《北福地》附表四“陶片统计表”中以人面纹陶片进行统计③，在正文的叙述中将其全部认定为假面面具。经过类型分析，我们发现这批人面纹陶片的形态差异明显，其类型和功能等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一、人面纹陶片基本情况

在《北福地》第五章第四节以“刻陶假面面具”为题，对人面纹陶片进行了专题介绍。在形制描述中，我们得知：“大部分利用陶直腹盆的腹片和底部片，刻镂为人面或者兽面，其中的兽面种类有：猪、猴、猫科动物等，图案的内容的表现方式主要是逼真象形和变形抽象象形，雕刻技法上属于平面浅浮雕，具体技法为阳刻、阴刻、镂空相结合。根据其使用功能，统称为假面面具。”④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接着使用线图、文字，以及彩色、黑白照片等手段，详细介绍了83件“面具”材料，包括出土单位、制作的方式、各种测量数据等。此外，在第四章第一期遗迹、第五章第一期遗物、第十二章结语、附表一（北福地遗址房址登记表）、附表三（北福地遗址灰坑登记表）、附表四（北福地陶片统计表）等内容中，也分别进行了描述、统计等，这使得我们有了充分的基本材料。

根据《北福地》，这批人面纹陶片的总数至少有145件，其中完整或可复原的10多件⑤。我们从报告遗迹、遗物的部分及相关附表中，统计出具有编号的人面纹陶片共计84件（表一），出土单位如下。

表一　北福地出土人面纹陶片统计表

地层（9件）		房址（42件）		灰坑（33件）	
单位	编号	单位	编号	单位	编号
T14 （4件）	②:11　②:25 ③:12　③:35	F1 （21件⑦）	5、8、32、50、51、52、54、59、60、62、64、65、72、73、74、75、76、135、136、137、138	H45 （1件）	2
T32 （1件）	③:3	F2 （8件）	1、57、53、54、58、87、88、89	H52 （10件）	1、3、4、9、10、30、32、33、34、35
T34 （1件）	③:2	F5 （1件）	53	H53 （1件）	12
T204 （1件）	③:1	F11 （2件）	2、3	H76 （15件）	3、14、34、41、49、52、55、56、57、59、72、73、74、78、82
T205 （2件）	②:10 ②:11	F12 （9件）	1、2、4、7、12、13、15、16、25	H78 （5件）	1、5、10、11、13
		F15 （1件）	1	H103 （1件）	2

《北福地》第五章第四节介绍了83件人面纹陶片，多出土于房址的地层堆积中⑥，绝大多数为残片，少量可复原。大致判断为人面纹陶片，但残缺部分太多或仅存边角部分的，共计48件；无法判断其为人面纹陶片或残存部分所属部位不详者，计21件。上述69件信息不完整，不便于分类，因此，本文的人面纹类型分析，主要是针对这些完整或者相对完整的15件进行的。

二、人面纹陶片的分类

根据15件人面纹陶片的尺寸，我们将其分成三组（表二）。

第一组，长或宽15厘米及以上。

4件，大致可分成两型。

A型，主要特征是方形脸，眼睛平视。标本有F12:7和H76:3。

B型，主要特征是脸部略窄，眼角倾斜向上。标本有F2:1和H78:1。

第二组，长和宽10厘米左右。

6件，分两型。

A型，眼睛平视。标本有H76:14和F11:3。

B型，眼角倾斜，从眉弓至鼻翼呈现出弧形。标本有F1:76、F1:32、H76:78、F1:54。

第三组，长宽均小于10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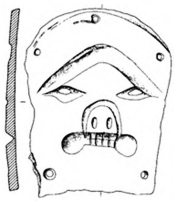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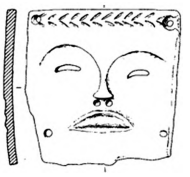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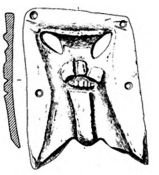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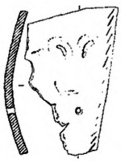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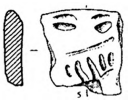
5件，分两型。

A型，眼睛平视。标本有F1:75、F12:1、F12:4。

B型，眼角倾斜向上。标本有T204③:1、F12:2。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表二　人面纹陶片的类型

分组	A 型	B 型
第一组 4 件	 F12∶7　 H76∶3	 F2∶1　 H78∶1
第二组 6 件	 H76∶14　 F11∶3	 F1∶76　 F1∶32　 H76∶78　 F1∶54
第三组 5 件	 F1∶75　 F12∶1　 F12∶4	 T204③∶1　 F12∶2

第一组的人面纹陶片尺寸最大，4 件作品的口、鼻、眼睛等面部特征完整，并且四角均有穿孔。经过测量，4 件陶片的尺寸与人脸的尺寸接近⑧。

4 件标本的高在 131 ~205 毫米之间，平均 178. 5 毫米，现代北方男性头长数值为 184. 2 ±8. 6 毫米，现代北方女性数值为 175. 8 ±7. 5 毫米；4 件标本的宽在 123 ~143 毫米之间，平均 132 毫米，现代北方男性的头宽数据是 155. 4 ±9. 8 毫米，女性数值为 148. 9 ±9. 0 毫米；眼内角间宽，北福地 4 件标本数值在 35 ~50 毫米之间，平均数值为 33. 75 毫米，现代北方男性数值为 36. 6 ±5. 1 毫米，女性数值为 35. 5 ±4. 7 毫米；眼外角间宽，北福地标本数值 67 ~83 毫米，平均 73 毫米，现代北方男性数值是 91. 8 ±8. 1 毫米，女性数值是 87. 7 ±7. 0 毫米。

第一组 4 件人面纹陶片的几项数值，特别是眼内角和眼外角间宽，与我国北方人的活体测量数据吻合。每件器物的四角，各有一个穿孔。综合考虑，我们推测这组人面纹陶片可能是佩戴于面部的面具，这应该是我国目前最早的面具标本，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根据这几件面具的尺寸，可以大致复原佩戴面具的北福地人形象：头部较狭长，面阔，两眼间距离较宽，这跟现代华北方言族群的活体测量数据接近，特别是跟北方女性的数据更为接近（表三）。

表三　第一组人面纹陶片数据与现代北方人面部数值对比

单位：毫米

	F2∶1	F12∶7	H78∶1	H76∶3	平均	华北方言区	西北方言区	东北方言区
高（头长）	205	186	192	131	178. 5	185. 0 ±8. 3 176. 1 ±8. 4	183. 2 ±9. 0 173. 9 ±8. 9	184. 0 ±8. 6 176. 9 ±7. 3
宽（头宽）	132	143	130	123	132	142. 4 ±9. 2 134. 7 ±8. 2	136. 1 ±8. 6 132. 8 ±7. 1	148. 6 ±9. 4 142. 0 ±9. 0
眼内角间宽	44	50	40	35	33. 75	37. 6 ±5. 0 36. 5 ±6. 5	37. 1 ±5. 3 36. 0 ±5. 0	34. 7 ±4. 5 33. 7 ±4. 1
眼外角间宽	83	72	70	67	73	93. 5 ±9. 0 89. 5 ±7. 6	91. 1 ±5. 6 87. 0 ±4. 8	89. 8 ±7. 8 85. 9 ±7. 1

注：数据来自宇克莉等人。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第二组的人面纹陶片，高和宽均 10 厘米左右，即便考虑到残损的因素，这组和第一组相比明显变小。第二组多数没有穿孔，如相对完整的 H76∶14、F1∶54 均没有发现穿孔的迹象，只有 F1∶76 有 1 个孔。这组 6 件器物中最大的 4 件 F11∶3、F1∶76、F1∶32 及 F1∶54 的眼内角间宽 20～54 毫米，平均 24.8 毫米，眼外角间宽 32～54 毫米，平均 42 毫米。这两组数值明显比现代北方人的较小数值——女性数值还小（现代北方人的女性眼内角间宽数值为 35.5±4.7 毫米，眼外角间宽 87.7±7.0 毫米），较第一组面具数值小。因此，推测这组人面纹陶片的功用，可能用于陈设，或者是绑在木板上，手持使用；当然，考虑到部分陶片有穿孔这个因素，不排除有小孩使用的面具的可能性。

第三组的人面纹陶片，形制最小，高度多在 4～8 厘米、宽度多在 4～7 厘米，但眼、鼻、口部完整，应该是佩戴的饰品。除了人面纹陶片，还发现 1 件跟这组器物非常相似的石制品 F12∶4。这组器物镂孔的眼睛可能兼做穿孔系栓之用。

三、人面纹陶片的相关问题

经过上面的类型分析，可以得知北福地的人面纹陶片至少可分为佩戴的面具、手持的器物和人面饰品三大类，类型的差异，也意味着面具的功能有所区别。要全面了解面具各自的功能，需要仔细分析面具的出土地点、共存的器物、制作方式，以及遗址的性质和北福地先民的生业模式等方面。

1. 人面纹陶片的出土层位

《北福地》人面纹陶片“绝大多数出自房址，少量的出土于灰坑，而且集中出土于三座灰坑”⑨。查阅原文，一共有 F1、F2、F5、F11、F12、F15 等 6 座房址，H45、H52、H53、H76、H78、H103 等 6 个灰坑出土人面纹陶片，出土较多的 3 个灰坑是 H76（15 件）、H52（10 件）、H78（5 件），另外 3 个灰坑每个仅有 1 件人面纹陶片出土。灰坑中出土人面纹陶片最多的 H76（15 件），《北福地》推测是一个未完成的房址（但没有把它编号为房址），由此，人面纹陶片基本上出土于房址，可以说是房址的基本器物之一。

据《北福地》第四章第一节“房屋”介绍说，面具发现在房址的填土中，如“（F1）房址填土出土遗物非常丰富，包括天然砾石块……刻陶面具、核桃楸果核等”⑩，而在同章第三节“聚落形态简析”中，具体介绍说：“F1、F2 和 F12 等房址居住面上发现基本的完整的刻陶面具，表明面具在不少房屋内属于一种较常见的物品。”⑪从上述记录中，北福地人面纹陶片的层位似乎可以细化为两个：一个是在房址的地面，《北福地》显示居住面为褐色硬土，是房址的堆积；另一个在房址的填土中，根据《北福地》，填土一般是黑灰色土。至于分别出土于房屋居住面上或填土里人面纹陶片的具体数量，《北福地》没有披露。

在遗迹单位的平面位置，根据房址的平、剖面图，第一组人面纹 A 型 F12∶7 发现在中部偏西⑫，外侧靠近 3 号柱洞（D3）；B 型人面纹 F2∶1 发现在 F2 的东北角，外侧紧挨着 1 号柱洞（D1）⑬；B 型人面纹 H78∶1，位于 H78 西南角。其他人面纹陶片的具体位置，《北福地》未见标出。

2. 与人面纹陶片共存的器物

F1、F2、F5、F11、F12、F15、H76 等 7 座集中出土人面纹陶片的房址中，F1、F2、F12 保存相对完整，出土遗物较丰富。

F1 是北福地遗址中出土遗物最丰富的房址，人面纹陶片也出土最多，如编号 F1∶75、F1∶74、F1∶73、F1∶32、F1∶58 等多件，同出的遗物非常丰富，主要有天然砾石块、石料、各种类型的石制品、陶器残片、核桃楸果核等，总数高达 2081 件，陶片 374 片，约占总数的 18%。数量最多的石制品，砾石、细石器及石质品及废料等，约占总数的 82%⑭，因此，发掘者认为，“房屋内充满了浓厚的砾石气息”⑮。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F1 出土器物的数量虽多，但实用型器物只占很小的比例，绝大多数的是废品及残缺品，仅复原直腹盆 1 件，基本完整品及残缺破石器 6 件；复原面具 4 件，这显示 F1 可能跟季节性及制作加工地有关。

在北福地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祭祀场（也可能是墓地⑯），发现了 11 组祭祀遗迹，91 件遗物，其中，石制工具 41 件，分别是耜 1、斧 16、铲 12、锛子 3、凿 2 件、刀 1 件、磨棒 1 件、磨盘 1 件、卵坠 4 件，斧和铲是主要器物；陶器 35 件；玉器 6 件；水晶 2 件；绿松石 4 件；石雕 1 件；砾石 2 件。但没有 1 件人面纹陶片。

从上面的情况可以看出：人面纹陶片出土于房址，与石器、陶器共存，是房址器物组合的基本器形之一，出土的位置不太固定，已知的 2 件出土在房址的中部和东北角。不是被祭祀的器物，在祭祀场里没有发现人面纹陶片。



图一　北福地遗址出土的石叶工具
1、2. 石叶（F1∶151　H76∶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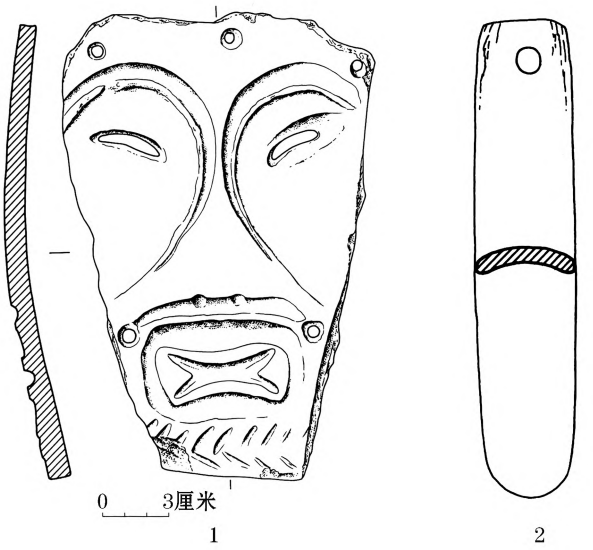
3. 人面纹陶片的制法

关于人面纹陶片的制法，《北福地》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和判断⑰。经过观察实物⑱和彩版照片及线图，发现其加工过程中综合使用了凿刻、磨刻、线切割技术、对钻、管钻等方法。

通过观察，人面纹陶片的制作流程大概如下：选取直腹盆残片，主要是选取腹片作为原材料。使用石锤、石斧等重型工具进行修坯成型。然后使用小型工具，如石叶工具、雕刻器等进行雕刻、剔划；使用刮削器、管状物、石钻等工具进行开孔。最后，部分大型人面纹陶片（如作为面具的第一组的人面纹陶片），可能使用了某种染料进行涂色。

石斧和石锤等工具在北福地均有发现。《北福地》报道了许多细石叶，其中多件具有锋利的尖部，特别是 H76∶150⑲（图一，2）和 F1∶151⑳（图一，1），观察照片，这 2 件石叶似乎使用了勒瓦娄瓦技术，中部都有一条纵向脊，顶端有较长的尖，虽看不到修理的描述，从器形上看，推测是石钻或者雕刻器。北福地一期应该也使用了骨锥，可能是遗址的原因，骨器和动物骨骼等有机质没有保留下来。

人面纹陶片的边缘有切割修整痕迹，由于没有微痕分析报告，通过与此同类的兴隆洼文化的玉玦等器物的研究结论，推测北福地可能存在线切割技术㉑。



图二　北福地一期刻陶假面面具
1. 面具（F2∶1）　2. 匕形器（J∶87）

北福地一期文化的钻孔技术很发达，对钻、管钻均有使用。人面纹陶片四周的孔，如 F2∶1，可能使用了对钻，孔径 0.4 ~ 0.5 厘米（图二，1）。编号 J∶87 的匕形器，孔径 0.6 厘米㉒（图二，2），应该使用了管钻。

4. 人面纹陶片的颜色

关于人面纹的颜色，笔者对《北福地》报道的 83 件相关材料进行了统计。红褐陶 50 件，灰褐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陶18件，褐陶3件，黄褐陶3件，黑褐陶5件，黑灰陶4件。可以看出，褐色是主体，特别是红褐陶居多，超过60%，灰褐色次之。黑灰或者黑褐陶共9件，数量最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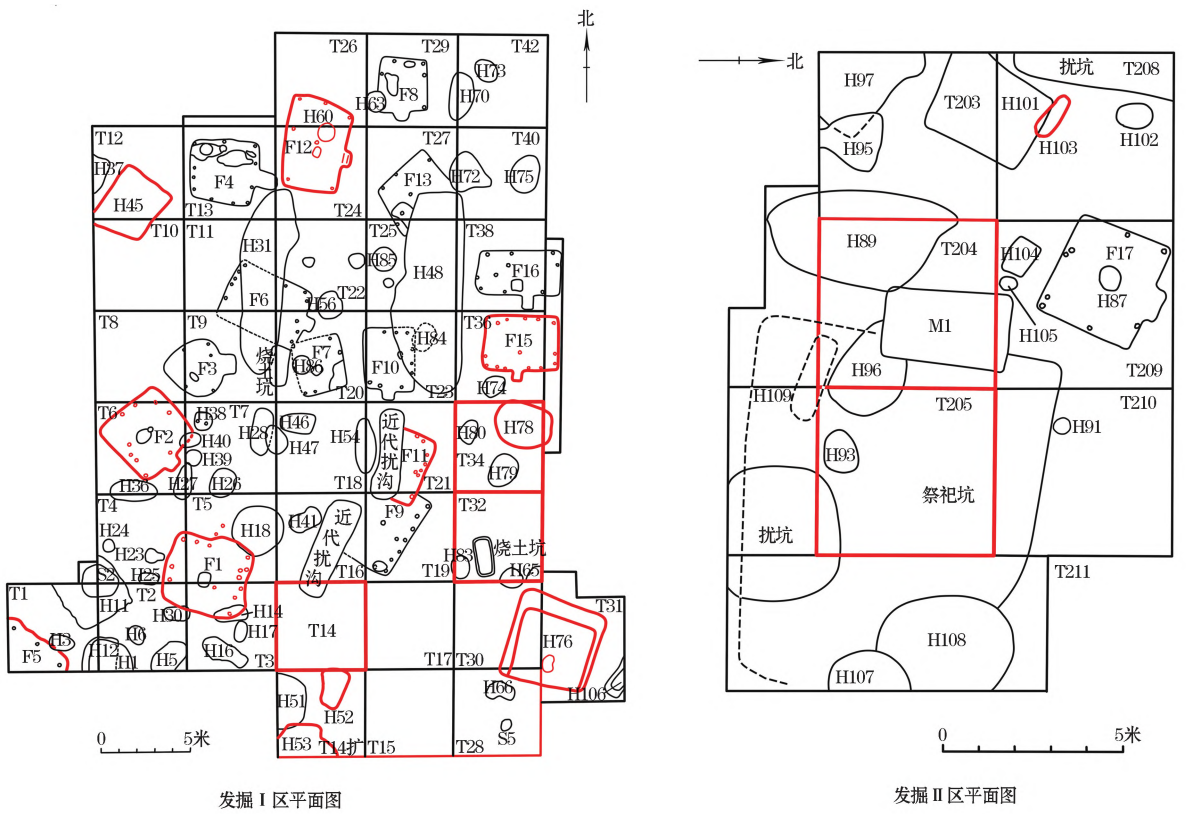
根据《北福地》介绍，第一组人面纹陶片多是直腹盆的残片，口沿和腹部片居多，多为夹云母的陶片，《北福地》在介绍第一期的遗物的章节，“器表颜色以灰褐色为主，另有少量红褐色、黄褐色，色多不纯，有灰色或黑色斑块”[23]。它们的内壁均是红褐色。通过观察彩版，发现部分人面纹陶片最初可能上面涂有颜色。比如，F2:1，似乎有意将鼻子的三角区，以及额头部分留下褐色，其他地方均是呈现出红色。H76:3，主体是黄褐色，从照片上看，口部，鼻子附近的区域是黑色，好像是一种黑色的染料涂黑的。另外3张彩版照片没有看到涂色的情况。其他更多的人面纹陶片上的颜色，文字不见描述。

北福地遗址出土陶片的总量在所有出土遗物中占比较低，如出土陶器数量最多的遗迹单位H76和F1，分别出土陶片455件和374件，仅占各自出土总量的13.3%和27.4%[24]。根据《北福地》第289—292页的陶片统计表，出土陶片的单位共计有7个，分别是F1、F2、F7、F12、F16、H52、H76，共计出土陶片1594件，其中，人面纹陶片共计175件[25]，约占全部北福地一期文化陶片的11%。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北福地的陶器数量稀少，显示陶器在当时使用频率不高，陶器不是最常使用的器物，另外，陶片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做人面纹陶片，这显示陶片似乎是一种资源性的存在。

5. 人面纹陶片与房屋布局

关于北福地遗址的房屋布局，发掘者认为F1、F2、F3、F5、F6、F12等一组房址，西南—东北走向，而以F7为代表的包含F8、F10、F15、F16等一组房址，基本上南北走向，根据器物及房址群的方位差别，发掘者推测F1组早于F7组房址[26]。

朱延平在《读〈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27]一文中指出，北福地发现的16座房址呈现出两两相对的组合关系，如F15与F16，F7与F10，F8与F12，F9与F11，F1与F2，F3与F6，构成



图三　含人面纹陶片的遗迹单位分布图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一组房屋，并且出土物一多一少。根据这样的现象，他推测房屋的废弃方式与祭祀有关。并且提出6对房址中，以F1、F2、F3、F6、F7和F9、F10、F11这8座的空间关系特殊，大体上围成一个圆环形，与姜寨凝聚式的环状结构类似。

有趣的是，笔者把发现面具的房址，在平面图上（图三）标示出来后，发现人面纹陶片基本上分布在外围房址，出土人面纹陶片房址的排列方向，与朱延平的设想基本一致，因此，大体可以确定北福地遗址是由若干屋群组成的凝聚式的建筑布局，为探讨北福地房址的布局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2003—2004年发掘的两个区域中，发掘者将陶器分为F1组和F7组早晚两期[28]：一期写实，颜色较深，口沿下纹饰较窄，图案规整紧凑；二期颜色较浅，纹饰带变宽，纹饰组合和内容趋向松散和潦草。人面纹陶片跟这个相仿，其中的面具多数位于F1、F2为主的房子内，属于北福地一期文化的偏早期阶段。

四、结　论

通过上述的观察分析，笔者将北福地人面纹陶片分为三组，每组类型的功能用途有所不同：第一组，是形似真人大小的方脸，功能之一很可能是面具；第二组人面纹陶片形制略小，多数没有钻孔，推测可能是陈设饰物，或者为绑在木板上，手持使用；第三组形制最小，应是悬挂佩戴的饰品。

对于北福地这批面具材料的界定，《北福地》认为其功能可能是一种原始宗教或巫术用品，用于崇拜祭祀或巫师实施巫术时的辅助工具[29]，无疑是很有见地的认识。但笔者注意到，面具多是由直腹盆盂的残片做成，显示是一种消耗品，神圣性不强，因此，第一组面具可能另有功用。

中国北方地区的面具等雕塑，多发现于房屋和灰坑里[30]，北福地的这7件面具也集中发现在房子和灰坑里，而在Ⅱ区的祭祀场里并没有发现，祭祀场的活动面上主要是：石雕动物头像、水晶、陶器、磨制石器、玉器等，却没有1件面具，这显示这类面具似乎与祭祀关系不大。

第二组和第三组人面纹陶片，相比第一组，尺寸小，形制也有差别，推测可能与陈设或配饰相关。北福地一期文化与兴隆洼文化具有紧密的联系，北福地的先民对兴隆洼有精神上的追崇[31]。因此，在兴隆洼、白音长汗等遗址发现的多件用于佩戴的人面像，可能就是兴隆洼文化对北福地文化影响的直接体现。

通过对北福地遗址出土的人面纹陶片的分析，可以看到，人面纹陶片多分布在房址和灰坑内，是北福地人生活的重要组成因素。人面纹陶片部分是用于佩戴的面具，这些面具是中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面具实物；部分人面纹陶片或陈设或佩戴，多跟装饰品相关。多用途的人面纹陶片，与“浓厚的砾石气息”同是北福地社会复杂过程的组成部分。凝聚式的建筑空间、特殊的祭祀场域、多用途的工具等促进了北福地一期文化自身特色的形成和社会体系的建立，一起构成了北福地一期独特的文化面貌。

［基金项目］本文是内蒙古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内蒙古高原岩画的类型研究”项目成果（项目编号：2022FY18）

附记：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延平研究员提出的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注　释：

① 拒马河考古队：《河北易县涞水古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②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文物出版社2007年，下同。

③④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第289—292页；第110页。

⑤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关于人面纹陶片和复原的数量，原报告有两组数据，第110页：“残片总数145件，其中完整或可复原的12件”；第244页：“出土陶面具残片总数175件，其中完整或复原10余件”。

（下转第103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⑰〔清〕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劄记校证》卷14《后魏以铸像卜休咎》，中华书局1984年，第301页。
⑱《辽史》卷37《地理志一》，第504页。
⑳李清泉认为，辽代丧葬制度之中帝后陵园专设影堂的习俗，始来自中唐五代之际寺院造作亡过高僧“影堂”，绘制已故高僧“真容”之类佛教丧葬习俗的影响。巫鸿、李清泉：《宝山辽墓材料与释读》，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年，第82页。
㉑㉒《辽史》卷11《圣宗二》，第134页；第131页。
㉓《辽史》卷24《道宗四》，第324页。
㉔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第4页。
㉕刘浦江：《契丹人殉制度研究——兼论辽金元“烧饭”之俗》，《文史》2012年第2辑，第181—182页。
㉖《新五代史》卷73《四夷附录第二》，中华书局1974年，第902—903页。
㉗《辽史》卷77《耶律颓昱传》，第1392页。
㉘㉛《辽史》卷10《圣宗一》，第117页。
㉙陈述辑校：《全辽文》卷4《耶律延宁墓志》，中华书局1982年，第95页。
㉚李思齐：《辽庆陵东陵人物壁画契丹小字墨书的复原与考释——兼论东陵圣宗陵说》，《北方文物》2021年第3期。
㉜《辽史》卷18《兴宗一》，第240页。
㉝〔唐〕孔颖达等：《尚书正义》卷第九《盘庚上》，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中华书局1980年，第169页。
㉞《辽史》卷73《耶律欲稳传》，第1352页。
㉟陈晓伟：《辽代功臣制度初探》，《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㊱《辽史》卷20《兴宗三》，第279页。
㊲㊴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69页；第308页。
㊳《辽史》卷80《张俭传》，第1407—1408页。

〔责任编辑、校对　王孝华〕

（上接第60页）

⑥83件中的33件出土于房址，约占40%，H76是未完成的房址（原报告也是这样推测，但还是把这个房址当作灰坑编号的），根据房址的排列规律，我们推测，西北角的H45也很有可能是房址，这样出土于房址的共计有50件，占到将近60%。
⑦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第25页，F1出土人面纹陶片38件，我们查到有编号的共计21件，其余碎片没有编号介绍。
⑧宇克莉等学者2009年至2012年测量了11732例（男性5840例，女性5892例）北方汉族的头面部人体测量学指标，分析了北方汉族头面部形态特征。结果显示，北方汉族男性、女性均为圆头型、高头型、狭头型、狭面型、中鼻型。在北方汉族中，东北方言族群头圆，头阔，头最宽，面最宽，两个下颌角间距离最大，两眼间距离最近，面高值大．鼻翼较宽，鼻狭，耳大，耳圆。华北方言族群头较狭长，额头窄．面阔，两眼间距离较宽，鼻背较低。西北方言族群头狭长，头短而高，面窄，两个下颌角间距离较窄，鼻短。本文的北方汉族头面部测量数据，均来自此报告，宇克莉、郑连斌、李咏兰、席焕久：《中国北方汉族头面部形态学特征》，《解剖学杂志》2016年第3期。
⑨⑩⑪⑫⑬⑮⑲⑳㉒㉓㉔㉕㉖㉘㉙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第110页；第25页；第49页；第37页；第29页；第49、239页；图版三三—2；图版三二—3；第155页；第84页；第84页；第244页；第240页；第243页；第134页。
⑭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第25页。原文“其中占据首位的是砾石，数量多达1503件，约占出土遗物总数的53.4%；其次是作为石制品废弃料的石片、石核、断块、废块等562件，约占遗物总数的20%；细石器247件，约占总数的8.8%”。
⑯㉛张弛：《〈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评介》，《文物》2008年第6期。
⑰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第110—111页，“在雕刻技法上属平面浅浮雕，为单面雕刻，具体技法为阳刻、阴刻和镂空相结合，表现形式为阴刻与阳刻线条、凹与凸块面浮雕，镂孔等几种形式交叉组合。其中以减地法刻出凹块面与凸块面的浮雕、用阴刻法勾勒出凹线条而对应组合图案的方法最为常见”。
⑱作者观摩陈列在河北博物院的实物。
㉑线切割技术，牟永抗最先提出命名，是以“柔性线状物带动砂粒切割”，“把动物毛皮或者植物纤维制成的绳子，作为砂粒的载体，沾湿后黏附砂粒成为砂绳，砂绳在玉料上往复运动，由坚硬的砂粒摩擦，达到分割玉器的效果。牟永抗：《良渚玉器研究三题》，《文物》1989年第5期，以柔克刚－线切割技术的来龙去脉，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编：《玉器起源探索——兴隆洼文化玉器研究及图录》，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2007年，第80页。
㉗朱延平：《读〈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考古》2008年第2期。
㉚曲彤丽、陈宥成：《欧亚大陆视野下的史前早期雕塑》，《考古》2019年第10期。

〔责任编辑、校对　田索菲　薛凯帆〕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